

“书生”姜义华：孜孜以求真历史

■文/历史季采编团 复旦大学博士生 林秋云

1962年,姜义华复旦大学本科毕业。原本成绩优秀的他可以继续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攻读硕士学位,因为“政治问题”,生于扬州的他最后被分配到了内蒙古呼和浩特铁路中学当初中老师。才一个月,他又以“反面教员”的身份被调回复旦,在资料室和绿化组里劳动。那年他刚刚23岁,风华正茂,踌躇满志,结果却当了17年“不可接触的危險人物”。直到1979年,得到平反的姜义华才第一次走上讲台,第一次专注于他多年来断断续续进行的章太炎研究。

尽管被耽搁了整整十七年,回顾往事之时,这位早已过了从心之年,满头白发的老人更多的时候是平静。当记者问到为什么当初没有考虑到“讲真话”会给自己带来风险时,姜义华只是说了这样一句,“我当时的想法是,我们已经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如果再不讲真话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无论是做人,还是治学,姜义华所执着于心的,始终不过是“求真”二字。他常说,他自己其实不过是个书生,他所尽的,不过是一介书生的责任。

从扬州到上海的“书痴”

边走边看书成扬州城美谈

姜义华的爱看书是出了名的。解放前,他念的是私塾,新中国成立时,快10岁的他才进入当时的东关小学。入学的时候,因为文化程度已经接近五年级的水平,学校就让他直接从四年级开始念起。由于是公办学校,东关小学不但免学杂费,还给学生发助学金。有了这笔钱,“城市贫民出身”的姜义华不但减轻了不少家庭负担,而且还可以览尽各种自己感兴趣的课外书,姜义华每天走路上学,而一边走路一边看书,也成了扬州城的美谈。

1954年,姜义华15岁,阅读外国小说《巴黎的陷落》,发现书里有很多地方的译名不统一,正在扬州中学念高一的他便给上海的《新民晚报》写了一封信:“我们读翻译小说,本来就有点困难,如果再加上这些可以避免而没有避免的缺点,困难就会更多了”,只是一个初中生的他写道,“我在这里提供这样的意见,希望翻译工作者重视这个问题。”

姜义华没有想到编辑最后竟然把他的来信登报了,为此他还获得了两块钱的稿费。当记者为他年纪轻轻便关心翻译工作这么大的问题时,姜义华说,他只是觉得同一本书中对同一个英文单词的翻译不统一是一个问题,既然是个问题,那就要提出来。

中学时代的他读了很多书,最经常看到的景象是,从家里去学校的路上,姜义华一边走路,一边看书。“手里总是要拿着书的”,姜义华的嗜书如命让他在扬州城里出了名,即便是后来考入复旦,他依旧不改初心,他的借书证换得最快,因为很快写满了,最后,图书管理员都成了他的好朋友,一有新书便通知他。“那时看了很多文学、社会学、经济学、哲学、历史学书籍。”在对记者回忆时,他还清晰地记得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代表小说,有俄罗斯的,也有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等。

1980年代,在北京的周谷城在病中请儿子周骏羽给姜义华写信,其中除了提到姜义华在五七干校时,经常帮助他干重活外,也提及当年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担任教授时对姜义华的深刻印象:极爱读书。

在最不可能的条件下读书

姜义华进入复旦的时候,“整风运动”还在如火如荼地开展。那时候班级上,宿舍里,到处都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对于同学们热衷于写大字报,姜义华只是觉得,与其把精力耗费在整天写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还不如多花些时间好好读书。所以一进复旦,他便去拜访了当时在历史系里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最高的陈守实先生。



①



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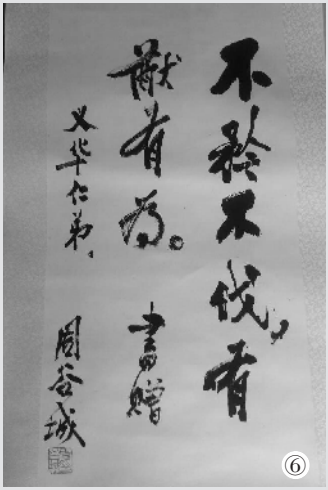
③



④



⑤



⑥

- ①70大寿与章清(后中)等学生在一起
②2003年受访问希腊
③1980年底,姜义华(右一)与(右起)老师蔡尚思、胡绳武、金冲及和同学王学庄
④1998年,在番禺,和费孝通(中)、李亦国合影
⑤1986年,在杭州章太炎墓前
⑥周谷城所赠墨宝

陈守实一直是姜义华很敬佩的几位先生之一,在他看来,能够像陈先生那样借鉴《资本论》来研究中国古代的土地关系史,并且能形成自己的一套见解和体系的,在当时并不多见。在陈先生的建议下,姜义华从图书馆借回了《资本论》和达尔文的《人类原始及类群》,寒暑假期间,他也很少回家,基本上都是在学校里看书。他的阅读量很大,图书馆里相关学科的书基本上全被他看了个遍。同学嘲笑他,还在他床头贴了一张“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大字报。

读书已然成为了他生活中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往内蒙古教书,到达呼和浩特第一件事是逛古旧书店,买书看书;在被调回复旦大学的资料室和绿化组劳动,无法从事正常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时,记挂在心的还是尽可能利用各种诸如资料索引的机会,阅读各种旧报刊和旧图书;即便是后来文革开始,什么事都做不了了,在接受批斗写各种反思总结之余,他依旧能够专心致志,反复精读马、恩、列宁的经典著作。

因为一直没有放弃读书和研究,1973年,姜义华受命参与章太炎《秦献记》《秦政记》二书的注释工作,后来又担任了注释组的副组长,选编和注释章太炎的著作,而给毛泽东点名的《虐书》做逐字逐句的注释校点的大字本工作,让他有机会读懂了那些深奥的古字。这些工作给了他在上海、北京等地广泛搜寻和阅读章太炎手稿的机会,同时也为文革结束后再次被打倒埋下了隐患。在后来接受审查的两年多时间中,虽然心有委屈,姜义华白天在人工工地挖防空洞,夜晚仍旧不忘校点章太炎的《春秋左氏传》,继续做他的关于章太炎思想的研究。

行万里路只为求真知

要对亲身参与过的历史有个判断

姜义华是“书痴”,可是他并不是个书呆子。如果只是喜欢“读万卷书”,或许他一路走来就不会有那么多坎坷和风波。姜义华还喜欢“行万里路”,他喜欢实践,喜欢在观察和思考,而不是盲目地“跟风”。

早在扬州念高中的时候,姜义华就利用暑假的时间做过调研。那会儿农业合作化如火如荼地席卷中国大地,姜义华以徒步的方式,在扬州、江都、泰州、泰兴、泰县、海安县、高邮、宝应的农村跑了一个月。“当时也谈不上进行什么农村调查,我只是想亲身感受一下农业合作化给广大农村带来的变化”。从农村回来的姜义华发现,他所接触到的农民,无论是男女老少,并没有如新闻宣传中的那样喜悦和欢欣,“对于新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民更多的情绪是期待与迷茫混杂在一起”。

人民公社化时期,姜义华在复旦一边上课一边参加劳动。他曾经和其他同学一样,积极地响应所有的号召,真诚地相信着这一切都会造福于民,造福于国家。直到有一年,他到崇明围垦发现粮食开始紧张不得不吃芦苇根填饱肚子;寒假在回家的途中亲眼看到有人走着走着就突然倒在地上口吐绿色浆液死去,火车站有人正在吃着的烧饼却被另一个人抢了去,原来山清水秀的农村变得光秃秃的,什么都不剩……

他的亲眼所见和亲耳所闻让他开始反省,毕业

前夕,复旦党委书记前来做形势报告,报告说,当前的问题主要是方法问题,是由于基层干部处理不当。姜义华在小组讨论时认为,是上层指导思想与政治决策出现了错误,把阶级斗争的对象搞错了。他还说,解放后这几年的工作太顺利了,所以就不太谨慎。尽管他的那些言论后来被历史证明都是正确的,在当时却是“大逆不道”。姜义华被扣上了各种帽子,甚至成为了“反党集团”成员。即便是这样,当他被分配到内蒙古时,心里想的还是可以结合当地的情况研究那里的土地关系;当他调回复旦从事体力劳动时,却依然记挂着能不能到下去看看现在的农村到底怎么样了。

“我只是想实事求是”,姜义华说,“这段历史是我们亲身经历的,我也曾那么狂热地相信和投入过,但结果却是发生了那么严重的问题。对于自己亲身参加过的历史,如果都没有办法作出一点判断,那还研究什么历史?”

怀着敬畏之心研究历史

姜义华的本科毕业论文是《论辛亥革命时期章炳麟政治思想》,而之所以会选这个题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系里当时有几位老师对章太炎的思想究竟属于地主阶级反满派还是农民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存在很大争议。姜义华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点“先下结论,后找相应材料论证”,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在没有系统梳理章太炎的著作之前,不应该那么草率地先入为主。

尽管指导他毕业论文的蔡尚思先生是第一种观点的支持者,姜义华还是在文中提出了异议。最终,他的论文不但获得了好评,《光明日报》史学专刊准备刊登。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黎澍先生表示愿意接受他攻读研究生学位。

除了章太炎,姜义华还关注诸如康有为、孙中山这样的近代人物思想。之所以关注这些人物,姜义华认为,“这样可以防止研究的片面性”。康有为、孙中山等人都曾经是章太炎的同志,后来却因为主张不同而分道扬镳。“想要全面了解章太炎的思想,就得以前同样认真的态度考察反对章太炎的这些思想”。他对历史研究的严谨可见一斑。

严谨更重要的是为了求真。一次次下乡的经历以及课堂上先生们讲授过的关于中国土地制度变革与演进的内容让他始终对农民问题无法释怀。1979年,刚平反不久的他就开始发表一系列与这个问题相关的论文,诸如《列宁主义与战时共产主义》一文阐述了列宁关于农民问题前后观点的变化,《论农民运动与启蒙运动在现代中国的拮据与对立》《论中国二元化社会激荡的昨天、今天与明天》则是专门讨论应该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价近代以来农民运动。1992年,他的《百年蹒跚——小农中国的现代觉醒》在香港和台湾陆续出版,他给自己在这方面的研究提交了一份比较满意的答卷。

姜义华曾经写过一本书,书名就叫做《信史立国》。“只有可信的历史,真正可靠的历史才有可能作为我们立国的基础”。姜义华认为,违背历史、歪曲历史,对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做出各种非历史的解释,都是非常不利于国家发展的。只有正确认识历史,国家的发展才会有牢固的根基。

从文明的根柢再出发

要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

研究章太炎起家的姜义华,对近代启蒙与救亡并存的情况下纷纷涌入中国的各种西方思潮并不陌生,他本人曾经深受马列主义的影响。如果不是自己和共和国一路走来,经历和见证了如此多的曲折往复,他会苏联模式深信不疑。(下转第3版)